

聶石樵文集

第七卷

玉谿生詩醇

中華書局

聶石樵文集

第七卷

玉谿生詩醇

中華書局

自序

一

李商隱，字義山，號玉谿生，又號樊南生。生於唐憲宗元和七年（八一二），卒於唐宣宗大中十二年（八五八）。祖籍懷州河內（今河南沁陽），從他祖父李浦起，遷居滎陽（今河南滎陽），因此滎陽就成了他的第二故鄉。

李商隱的父親李嗣，曾做過獲嘉（今河南獲嘉）縣令，他即誕生在父親的任所。三歲時，父親罷獲嘉令，改任紹興、鎮江一帶的幕僚約六七年。他隨之在江南度過了自己的童年。十歲時，父親死於幕府，他不得不奉喪侍母由江南返回滎陽。這時期，他的生活是極端艱苦的，所謂“四海無可歸之地，九族無可倚之親，既祔故丘，便同逋駭；人生窮困，聞見所無”（《祭裴氏姊文》）。在滎陽住了兩年，父喪除後，又把全家遷到洛陽。嚴峻的生活環境砥礪着他的性格，迫使他勤苦學習。“九考匪遷，三冬益苦”（《上漢南盧尚書狀》），正是他勤苦精神的自我寫照。他希圖通過學習能科舉進身，重振門庭。當時他的一位堂叔對他幫助很大。這位佚名的堂叔隱居不仕，憤世嫉俗，並擅長古文、古體詩和書法。李商隱對之十分敬佩，並深受其影響，在他的薰陶下，幼年早熟，“以古文出諸公間”（《樊南甲集序》），開始走向應舉的道路。

李商隱十六歲為參加進士考試而進行“溫卷”活動，首先得到

令狐楚的賞識。令狐楚任天平軍節度使(駐鄭州),辟他爲巡官,其時他纔十八歲。令狐楚對他竭誠獎掖,讓他與自己的兒子同學,親自指點,教他寫作今體文。從此李商隱由長於寫古文一變又以擅寫駢體文聞名當世。令狐楚對他的影響是很大的,以至於決定他一生的政治道路和詩歌創作。令狐楚死後,李商隱沉痛地悼念說:“百生終莫報,九死諒難追。”(《撰彭陽公表文畢有感》)充分表露了自己感恩戴德的心情。

其次得到崔戎的賞識。當時他二十二歲,初次到京城應舉落選,心情十分苦悶,窮途知遇,分外高興。崔戎是他的從表叔,任華州(今陝西華縣)刺史,辟李商隱爲幕僚,不久崔戎被調任兗州(今山東兗州西)觀察使,他又隨之赴兗州去了。在崔戎幕府中,他深受府主的器重,與幾位表兄弟相處得很融洽,因此心情比較愉快。可是不久崔戎病死於任所,他無所依倚,便往返於洛陽和滎陽之間。此時,他還曾在河南濟源的玉陽山、王屋山一帶隱居學道,這一方面由於科場失敗,精神苦悶,需要宗教思想來解脫,另一方面名山勝景也可以讀書習業,以利應試,並博得清高的美名,一旦朝廷重用,即可舒展懷抱。

李商隱自二十一歲起,曾三次應進士考試,二十六歲那年,經令狐綯推薦,得登科第。第二年入涇原節度使(駐今甘肅涇川縣北)王茂元幕。王茂元愛其才,將女兒嫁給了他。他先前依附的令狐楚原屬牛黨,而王茂元則被目爲李黨。李商隱並不以任何黨人自居,也無以婚姻來謀取富貴的意圖,但他這一行動,卻招致了牛黨的忌恨。開成三年(八三八),他應吏部“釋褐”考試,先爲考官周墀、李回所取,復審時被“中書長者”抹去。這次打擊,使李商隱對勾心鬭角的黨爭有了切身的體會,發出了“莫近彈棋局,中心最不平”(《無題》)的喟歎!開成四年,他再應吏部“釋褐”考試入選,

授秘書省校書郎。校書郎品秩不高，但職屬清要。可能由於牛黨的排擠，不久又外調為弘農尉，從清職降為俗吏。

縣尉是一個直接壓迫人民、剝削人民的職位，這是李商隱所不忍心做的。他到任不久，即因為“活獄”觸怒了陝虢觀察使孫簡，便辭職回京，並沉痛地說：“卻羨卞和雙刖足，一生無復沒階趨。”（《任弘農縣尉獻州刺史乞假歸京》）表現了一個有正義感的詩人的錚錚鐵骨。

李商隱辭去弘農尉的第二年，文宗死了，武宗即位，任李德裕為宰相，王茂元也由涇原內召入京為朝官。李商隱認為在政治上進取的機會來到了，因此由濟源把家搬到長安，所謂“移家關中”。可是在長安並沒有什麼新的出路，秋冬之際，應楊嗣復之招，便南游江鄉。然而楊嗣復由湖南都團練觀察使，再貶為潮州刺史。他到湖南後，並未見到楊嗣復，幾個月就回來了。江鄉之游，頗違初意，情緒闌珊，“目斷故園人不至，松醪一醉與誰同”（《潭州》），乃情乃景，誠何以堪！會昌二年（八四二），他參加吏部的書判甄拔試入選，授秘書省正字。這是他第二次入秘書省，當時三十一歲，希望從此重振家聲。他在《祭徐氏姊文》中說：“三千有司，兩被公選，再命芸閣，叨迹時賢。”即流露了這方面的得意心情。

但是，同年冬天，他母親不幸病故，他不得不離職回家服喪。這期間他為母親、先輩親屬和小侄女營葬，自認為是了卻平生一大心事。不久又移家永樂（今山西芮城縣），過了一段清閑寧靜的生活。但他並沒有忘懷國家，仍然嚮往長安：“身閑不睹中興盛，羞逐鄉人賽紫姑。”（《正月十五夜聞京有燈恨不得觀》）他為自己不能為武宗的“中興”事業出力而抱愧。

李商隱三十四歲那年服喪期滿，重返秘書省正字任。幾個月後，武宗死了，宣宗即位。宣宗一反武宗重用李黨的政策，而重用

牛黨，大黜李黨。李商隱因爲就婚王氏，被目爲李黨，秘書省的清職難以保持下去，他於宣宗大中元年三十六歲時，又開始了天涯飄泊的幕府生涯。當時李黨的給事中鄭亞外放，出爲桂州刺史、桂管防禦觀察使。他被辟掌書記，很受禮遇。不過由於間關遠隔，孑然一身，一年的桂管生活，始終處在憂鬱懷鄉的心情中：“越鳥巢乾後，歸飛體更輕。”（《晚晴》）他並未領略到桂林山水的秀麗，卻感受着荒陲絕域中的淒厲和險惡。

大中二年（八四八），李商隱以幕府職代理昭平（今廣西樂平縣）郡守，二月鄭亞被貶循州（今廣東惠陽縣）刺史。他失去了依靠，便取道潭州（今湖南長沙市）北返，在湖南觀察使李回幕稍事逗留，秋天歸洛陽，冬初返長安。在長安參加了冬選，爲盩厔（今陝西周至縣）尉。不久改爲京兆參軍，職典章奏。他目睹政局的動蕩，又激起憂國傷時的感情，他爲李德裕平亂的功勳被埋沒而鳴不平，爲劉蕡遭貶而悲痛憤慨。第二年，盧弘止鎮徐州，辟他爲判官，得侍御史。在徐州幕，他一反在桂林時那種憂鬱的情調，而是比較開朗、積極向上的，“此時聞有燕昭臺，挺身東望心眼開”（《偶成轉韻七十二句贈四同舍》），就是他當時精神狀態的寫照。大中四年，盧弘止卒，他入朝，以文章干宰相令狐綯，得補太學博士。這是他發爲“途窮”之歎時，第一次得到對他宿憾很深的令狐綯的幫助，他已經感到很榮幸了。同年，他的妻子王氏又卒。王氏是他思想上的同調，政治上的知己。王氏的死，對他是一次重大刺激。他寫了不少悼亡詩，以追念這位患難與共的伴侶，並撫慰自己感情上的創傷。

李商隱四十歲，柳仲郢調任梓州刺史、東川節度使。他被辟爲幕府書記。李商隱在梓州幕府五年，由於經歷了仕途的折磨和喪妻之痛，思想上趨向消極，虔心佛教。他在《樊南乙集序》中說：

“三年以來，喪失家道。平居忽忽不樂，始刻意事佛。方願打鐘掃地，爲清涼山行者。”日與和尚楚公、知玄交往。但是他並未完全脫離現實，他結合東川紀游寫了一些詠史詩，以爲當朝鑑戒。

李商隱四十五歲，柳仲郢調回長安任吏部侍郎，他也隨之還京，經柳仲郢推薦，任鹽鐵推官，並游江東。大中十二年，罷職，回鄭州閒居。不久便在淒涼寂寞中死去了。年僅四十七歲。“如何匡國分，不與夙心期。”（《幽居冬暮》）這是他臨死前寫下的名句。他雖有濟世之心，但終不得伸展，祇是壯懷徒抱，引爲平生遺恨！

李商隱是一位有卓越才能的詩人。但是“古來才命兩相妨”，他的不幸遭遇，卻激發了他滿腔的憤慨，培育了他優美的詩篇，形成了獨特的風格，成爲有唐一代一個抒情詩歌流派的代表。

二

李商隱是我國文學史上極爲重要的抒情詩人，他的詩歌內容十分豐富、深邃。從現存的六百多首詩歌看，他所涉及的範圍相當廣泛，如自傷生平之不得意，描寫“天荒地變”的現實，剖析晚唐的社會歷史面貌，申斥當時的黑暗腐朽勢力，抒寫深摯的愛情等等。並且不同於一般的抒情敘事，而是立意高、寄托深。他爲我國詩歌創作提供了許多新的因素，值得我們認真地探討和研究。

李商隱抒情詩中最突出的內容是自傷生平，這類詩歌在他的作品中佔很大的比重，如果不充分認識這類詩歌的意義，就不能對李商隱作出公允的評價。特別是其中關於抒發自己理想抱負的作品，是促成他全部詩歌創作的關鍵，應該重視；即使那些抒寫懷才不遇之作，也包含着對那個腐朽社會的憤慨和不滿，“虛負凌雲萬丈才，一生襟抱未曾開”（崔珣《哭李商隱》），是對他一生遭際的總

概括。

李商隱的詩歌，或通過寫景、敘事、議論等方式表現自己的志向和操守，或在吟詠、讚美歷史人物時即滲透了自己的理想和愛好。他青年時代寫的《初食笋呈座中》，即以初出林的竹笋自喻，自許雖為寸心，卻有凌雲壯志。之後，他寫的《安定城樓》，進而發出“永憶江湖歸白髮，欲回天地入扁舟”的豪言壯語，即希望幹出一番扭轉乾坤的事業來，且功成不受賞。這是一種很高的思想境界。這種思想貫徹於他一生的行動中。直到晚年，他還“且吟王粲從軍樂，不賦淵明歸去來”（《偶成轉韻七十二句贈四同舍》），但願從軍入幕，為國家做出貢獻。其間，儘管因為政治鬭爭形勢的變化，自己的遭際、情感隨之不同，這種思想也表現有強弱之分，但總是或隱或顯地見之於他的行迹。如“軍書雖倚馬，猶未當能文”（《夜出西谿》），說明自己的文才表現在軍事方面的僅僅是局部；“有客虛投筆，無憊獨上城”（《城上》），感歎天涯薄宦，壯志難酬；甚至在對其子充師的教育上也流露出來：“兒慎勿學爺，讀書求甲乙。穰苴司馬法，張良黃石術。便為帝王師，不假更纖悉。況今西與北，羌戎正狂悖。誅赦兩未成，將養如痼疾。兒當速成大，探雛入虎窟。”（《驕兒詩》）這不僅是懺悔自己讀書應舉，更重要的是以自己的抱負勉勵充師。

作為一個詩人，李商隱還把他的理想、抱負經過縝密的構思而形象化，把自己的品質、操守比喻、興寄為堅貞的松柏。如他在《西溪》中說：“野鶴隨君子，寒松揖丈夫。”認為為人要像野鶴那樣氣宇軒昂，為官要有勁松那樣的耐寒節操。這是以松柏寄興。他還以松柏自喻，如在《題小松》中說：“桃李盛時雖寂寞，雪霜多後始青蔥。一年幾變榮枯事，百尺方資柱石功。”頌揚松樹之傲霜雪，常榮不枯，可為國家柱石。又如在《高松》中說：“高松出衆木，伴我

向天涯……有風傳雅韻，無雪試幽姿。上葯終相待，他年訪伏龜。”讚美松樹挺出衆木之中，既饒“雅韻”，復具“幽姿”，生於松根的伏龜，終當爲世所用。這都是藉松樹抒情，是他自己思想、抱負的寫照。在《李肱所遺畫松詩書兩紙得四十韻》中還說：“孤根邈無倚，直立撐鴻濛。端如君子身，挺若壯士胸……寓身會有地，不爲凡物蒙。”這自然是以松樹比李肱，稱讚李肱有壯士的胸襟，君子的品德，非同凡夫俗子。但在稱讚中也滲透着自己的思想感情，具有着自己的精神世界。

李商隱還通過歌詠歷史人物以抒寫自己的理想和抱負。他對歷史人物不是單純地吟詠他們的品德、行迹，而是包含着自己的身世之感和不平之鳴。他有兩首寫諸葛亮的名作，即《籌筆驛》和《武侯廟古柏》。《武侯廟古柏》是贊美諸葛亮治蜀的文韜武略、統一中國的深謀遠慮以及功高不自矜伐的高風亮節，“大樹思馮異，甘棠憶召公”，表現了他對這位卓有政績的人物的追念。但是諸葛亮遭逢末世，雖有卓越的才能，並不能挽救蜀國的滅亡。“玉壘經綸遠，金刀歷數終。誰將《出師表》，一爲問昭融！”他對諸葛亮的志業未成，深致痛惜。很明顯，其中融入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對現實的政治感受。又《籌筆驛》也是慨歎於諸葛亮雖有卓越的政治、軍事才能和復興漢室的宏大志願，但終未能實現的悲劇下場：“徒令上將揮神筆，終見降王走傳車。管樂有才真不忝，關張無命欲何如？他年錦里經祠廟，梁父吟成恨有餘。”諸葛亮生不逢時，用《梁父吟》抒發自己的政治抱負。李商隱藉古人抒情，也以《籌筆驛》感歎自己冷落的一生，《籌筆驛》就是他的《梁父吟》。李商隱還以賈誼、王粲自況，“賈生游刃極，作賦又論兵”（《城上》），自歎文才武略俱備，治國游刃有餘，卻不被重用；“賈生年少虛垂涕，王粲春來更遠游”（《安定城樓》），自傷憂國傷時的懷抱不得伸展。他也以

庾信、沈約自比，“哀同庾開府，瘦極沈尚書”（《有懷在蒙飛卿》），藉庾、沈以抒憤。由於時代的影響和個人的經歷，他所吟詠的歷史人物都具有壯志未酬的悲劇特點。杜甫所謂“悵望千秋一灑淚，蕭條異代不同時”（《詠懷古迹五首》），也唱出了李商隱此時的心聲！

李商隱一生鬱鬱不得志，因此寫了不少懷才不遇的詩篇。他對李樞言即曾表示：“我有苦寒調，君抱陽春才。”（《戲題樞言草閣三十二韻》）說明自己的創作格調不高，不過是飢寒交迫中迸發出來的悲歎。這類詩歌還可以分為兩種情況：一種是藉詠物以抒情，詩歌的主題即是抒寫自己的身世之慨的；另一種是在吟詠其他情景中流露出自己的不平之鳴的。第一種情況如《蟬》、《流鶯》等，都寫得很成功。他寫蟬：“本以高難飽，徒勞恨費聲。五更疏欲斷，一樹碧無情！薄宦梗猶泛，故園蕪已平。煩君最相警，我亦舉家清。”蟬鳴以傳恨，但卻得不到知音。雖已聲嘶力竭，也得不到任何同情。宦途坎坷不遇，然仍自我警誡，以清高自持。他寫流鶯：“流鶯漂蕩復參差，度陌臨流不自持。巧囀豈能無本意？良辰未必有佳期。風朝露夜陰晴裏，萬戶千門開閉時。曾苦傷心不忍聽：鳳城何處有花枝？”流鶯巧囀怎能沒有本願？但佳期難逢，也無可奈何！在長安冒着朝風夕露流蕩漂泊，看偏了王門相府，也找不到知己，只有那令人不忍聽的辛酸的哀鳴。這兩首詩把詩人那種寂寞、悲傷、淒楚的精神狀態逼真地再現出來了。誠所謂“情真調苦”者也。此外，《回中牡丹為雨所敗二首》也是作者十分成功的自我寫照：“水亭暮雨寒猶在，羅薦春香暖不知。舞蝶殷勤收落蕊，佳人惆悵卧遙帷。”“玉盤迸淚傷心數，錦瑟驚絃破夢頻。萬里重陰非舊圃，一年生意屬流塵。”寫牡丹被冷遇之情還在，受寵幸之恩不知，以及為雨所敗後的狼狽神態和慘紅愁綠的樣子。這正是作者抒寫自己在仕

宦道路上，屢遭挫阨，如同雨打的牡丹，雖有國色天香，其奈雨橫風狂不捨朝暮何？又《北禽》以禽鳥自喻：“石小虛填海，蘆鉞未破罍。”慨歎身如精衛，心大力微，壯懷徒抱。又《落花》：“芳心向春盡，所得是霑衣。”心意不得施展，安能不作窮途之哭！第二種情況如《漫成五章》這組重要的詩篇，是直抒胸臆，不加雕飾，在評價初盛唐詩壇的演變與地位及重要政治家的業績時，即流露了自己的身世之感。“當時自謂宗師妙，今日唯觀屬對能”，暗喻自己雖為駢體章奏能手，又有何用；“集仙殿與金鑾殿，可是蒼蠅惑曙雞”，自負與杜牧齊名，為一代文宗，卻不為朝廷所重；“借問琴書終一世，何如旗蓋仰三分”，感歎自己琴書一世，反不如一個武將！這雖然都是自傷身世，但卻有憤世嫉俗的精神在。此外，抒發同樣情感的詩句，俯拾皆是，如“閑倚繡簾吹柳絮，日高深院斷無人”（《訪人不遇留別館》），他自比謝道韞，雖有賦雪高才，卻無人稱賞，迹同柳絮，只有沾泥而已；“淒涼寶劒篇，羈泊欲窮年”（《風雨》），自負有郭震作《古劒歌》的才能，而身世淒涼，不得其用；“滿宮學士皆顏色，江令當年自費才”（《南朝》），自比江總，雖然才高，不過祇作些豔體詩而已；“幾時心緒渾無事？得及游絲百尺長”（《日日》），暗示自己志大身閑，遠不迨游絲之卷舒自如。名篇《錦瑟》，據何焯的意見：“此篇乃自傷之詞。騷人所謂美人遲暮也。”詩云：“錦瑟無端五十絃，一絃一柱思華年。莊生曉夢迷蝴蝶，望帝春心托杜鵑。滄海月明珠有淚，藍田日暖玉生煙。此情可待成追憶，只是當時已惘然。”他回顧平生，雖然心懷大志，但仕途蹭蹬，祇做了幾任節使幕府的幫閑差使，豈不令人痛心疾首！這完全體現了他晚年的思想和生活情況，是他對一生的憤慨、不平、希望和失望的沉痛哀歎！李商隱集中寫自己的身世、經歷和抱負的詩歌是《詠懷寄秘閣舊僚二十六韻》。這是一首自傳性的詩篇，是對他四十歲以前生活的總結。

其中寫到自己青少年時艱苦學習的精神、爲人之謹慎矜持、爲官見輕於僕御、家境之艱難、宦情之冷落、敬神佞佛之不當、爲文不能傳世之可悲，等等。“圖形翻類狗，入夢肯非羆”，感歎志大才疏，反爲禍始厲階；本懷王佐之才，卻沉滯下僚。“乘軒寧見寵，巢幕更逢危”，回顧平生多次幕府生活，何曾得一夕安枕？“悔逐遷鶯伴，誰觀擇虱時”，悔恨要施展抱負，卻陷入無聊的黨爭。“奮迹登弘閣，摧心對董帷。校譬如有暇，松竹一相思”，最後祝勉舊僚奮迹臺閣，自傷儒冠誤身。結以松竹的節概砥礪自己，是一篇的本旨，正體現了李商隱的性格和精神。

李商隱自傷身世之作很多，他把一生滿腔的積憤發爲吟詠，“因事寄情，寓物成命”（《上令狐相公狀二》），寫景敘事，皆有寓意；狀物詠史，率多寄托。他在《上李尚書狀》中說：“未嘗輒慕權豪，切求紹介，用脅肩諂笑，以競媚取容。”以文證詩，則他的詩歌是他的思想、品德的真實再現。

在李商隱抒情之作中，還有一部分是抒寫愛情的詩篇。這部分詩歌可分爲與妻子王氏的愛情和與其他女子的愛情兩類。至於說與女冠來往的作品，那恐怕不能算作一種愛情了。李商隱寫與妻子王氏的愛情，包括婚前的傾慕，婚後的愛戀，死亡的悼念。寫婚前的傾慕，如《荷花》、《贈荷花》，以荷花喻王氏：“唯有綠荷紅菡萏，卷舒開合任天真。”以讚揚荷之花葉相映，天真自然，稱譽王氏的秀美。“此花此葉長相映，翠減紅衰愁殺人。”藉希望荷之花葉常榮不衰，表現他對王氏的愛憐和珍惜。寫婚後生活的詩篇如《漫成三首》，寫初婚時的愛悅之情：“霧夕詠芙蓉，何郎得意初。”表現同樣情景的如《細雨》：“帷飄白玉堂，簾卷碧牙牀。楚女當時意，蕭蕭髮彩涼。”末兩句由《楚辭·九歌·少司命》“與女沐兮咸池，晞女髮兮陽之阿”化來，意在說明這樣的絕代佳人，過去祇存在想

望之中，現在眼前的“蕭蕭髮彩”，不就是《楚辭》上所寫的“晞髮陽阿”的美人嗎？這種得意、喜出望外之情躍然紙上。但是，李商隱一生由於仕途漂泊，和妻子團聚的時間很少，兩地分居的時間卻很多。因此他與王氏的愛情詩更多地是抒寫離別之情和相思之苦。《夜雨寄北》是這方面的代表作：“君問歸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漲秋池。何當共剪西窗燭，卻話巴山夜雨時？”詩人留滯巴、閬，夜半聽雨，想到歸期渺茫，心緒惆悵，怎樣纔能回家閑話此時此刻的心情呢？馮浩所謂“語淺情深”。與此詩寫於同時的《因書》，表現同樣的感情：“生歸話辛苦，別夜對凝缸。”追憶初別之苦，預期後會之樂。又《夜意》則寫由於相思而形諸夢寐：“如何爲相憶，魂夢過瀟湘！”這類詩歌大都委婉曲折，一往情深。至於王氏死後，李商隱寫的悼亡詩就更多了。《正月崇讓宅》是其冠冕：“密鎖重關掩綠苔，廊深閣回此徘徊。先知風起月含暈，尚自露寒花未開。蝙拂簾旌終展轉，鼠翻窗網小驚猜。背燈獨共餘香語，不覺猶歌《起夜來》。”這是詩人自四川東歸，再到岳家崇讓里故宅，見人去樓空，遂生感慨而作。“蝙拂簾旌”、“鼠翻窗網”，想像伊人猶在。疑似之間，不禁“展轉”、“驚猜”。又好像背燈私語，嗅到餘香，重唱初婚合卺時之歌。完全是“從別後，憶相逢，幾番魂夢與君同”的境界。情摯意真，哀感動人！又《暮秋獨游曲江》：“荷葉生時春恨生，荷葉枯時秋恨成。深知身在情長在，悵望江頭江水聲。”全詩結穴在一“恨”字，而以“春生”、“秋枯”見變化。儘管生者幸存，人在情在，怎奈死者長往，逝如江波！《悼傷後赴東蜀辟至散關遇雪》：“散關三尺雪，回夢舊鴛機。”抒寫赴蜀途中遇雪，夢見王氏爲自己製作寒衣。無家而作有家之想，倍極悲感。李商隱的悼亡詩，都是血淚之篇！

李商隱所寫追求、懷戀其他女子的詩篇，其懷戀的對象多不可

考，寫作年代也不易確定，大都爲“無題”之作。這類詩篇反映了中晚唐文人生活的一個側面，感情真摯，旖旎動人。如寫愛情的堅貞：“春蠶到死絲方盡，蠟炬成灰淚始乾。”（《無題》）寫離別之恨：“夢爲遠別啼難喚，書被催成墨未濃。”（《無題四首》）寫心心相印：“身無彩鳳雙飛翼，心有靈犀一點通。”（《無題二首》）寫相思之苦：“春心莫共花爭發，一寸相思一寸灰。”（《無題四首》）等等。此外如《代魏宮私贈》、《板橋曉別》等則是寫其他人的愛情。這類詩歌都表現了在愛情追求中的苦悶和希望，流露了在愛情受挫折時的空虛和惆悵。

李商隱抒寫愛情詩篇的特點，是感情真摯，毫無做作，率爾成章，不加雕飾。因此能膾炙人口，經久不衰。後代的律體詩罕有能與之比者。在這方面，他在我國文學史上也獨樹一幟。

三

李商隱詩歌另一重要內容是描寫唐代“天荒地變”的社會，揭露統治階級的昏庸和腐朽等。這部分內容在他詩歌中所佔的比重之大，與唐代其他詩人比，也是十分突出的。李商隱是極爲關心現實和國家興亡的。他身歷憲宗、穆宗、敬宗、文宗、武宗和宣宗六個君主統治階段，其中文、武、宣三朝是他政治活動和詩歌創作的主要時期。這一時期的許多軍事、政治等重大事件，在他的詩歌中都得到真實的反映，並且表現了自己的觀點和看法。這類詩歌是他作品中最有價值的部分，也是最具有思想光輝的部分。

藩鎮割據是中唐以後唐王朝面臨的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。據歷史記載，當時“方鎮相望於內地，大者連州十餘，小者猶兼三四”（《新唐書·兵志》），他們據地抗命，恃強叛亂，分裂國家。李商隱對此極爲關注，他對朝廷的平藩戰爭積極擁護，對在平藩戰爭中有功

的將相也盡情歌頌。

會昌三年，昭義節度使劉從諫死，其侄劉稹據鎮自立，唐王朝令八鎮兵馬攻討，四年始平。這是李商隱生平所經歷的一次很大的平藩戰爭，他寫了《行次昭應縣道上送戶部李郎中充昭義攻討》一詩，正面描寫這次平藩戰爭的情況：“將軍大旆掃狂童，詔選名賢贊武功。暫逐虎牙臨故絳，遠含雞舌過新豐。魚游沸鼎知無日，鳥覆危巢豈待風？早勒勳庸燕石上，佇光綸綍漢庭中。”晉州刺史李丕被詔選為西面招討副使，追隨主將石雄長驅進討，致使劉稹處於“魚游沸鼎”、“鳥覆危巢”的絕境。詩人懷着戰爭必勝的信心，認為克敵制勝指日可待，勉勵石雄和李丕早立戰功，歸朝受賞。同時在《登霍山驛樓》中，還呼籲各路士兵：“壺關有狂孽，速繼老生功！”希望他們奮起作戰，驍勇奏凱。在《韓碑》中他又藉讚揚裴度平吳元濟之亂功居“第一”，來稱美李德裕在削平劉稹叛亂中立下的不朽業績。

德宗興元元年，朱泚據長安稱“秦帝”，神策軍將領李晟受命攻討，同年五月收復長安。李商隱攝取這一重要題材，寫成《復京》、《渾河中》等詩篇，讚揚李晟勤王以復京，稱頌渾瑊衛帝以免難，一攻一守，功足相匹。《復京》云：“虜騎胡兵一戰摧，萬靈回首賀軒臺。天教李令心如日，可要昭陵石馬來。”讚揚李晟有天赋的忠義，對唐王朝起了回天轉地、光復舊物的作用，並說明國家興亡，關鍵在忠臣效命，而不是乞靈鬼神。又《渾河中》云：“九廟無塵八馬回，奉天城壘長春苔。咸陽原上英雄骨，半向君家養馬來。”稱頌渾瑊及其部屬，雖出身微賤，但能臨危授命，無愧為保衛社稷的英雄。在對這些英雄人物的歌頌中，也包含着對叛亂者的憎恨和批判。

李商隱清醒地認識到藩鎮叛亂對唐朝軍事、政治貽患嚴重：

“昔年嘗聚盜，此日頗分兵。”（《淮陽路》）由於當年吳元濟在淮西叛亂，以致今天朝廷仍分派重兵駐守。對文宗將壽安公主嫁給成德軍節度使王元逵以示“懷柔”，他大不以為然，認為是喪權辱國，有助效尤：“四郊多壘在，此禮恐無時。”（《壽安公主出降》）此例一開，恐怕將來難於應付！他正告那些搞分裂割據的野心家：“莫向金牛訪舊踪！”（《井絡》）不要重蹈蜀王因貪圖“國寶”，把石牛要道奉送給秦國，結果為秦所滅的覆轍。他認為自德宗以後，藩鎮與朝廷之互相猜疑，是由於朝廷迷信武力，致使藩鎮人人自危，便走嚮公開抗命：“猜貳誰先致，三朝事始平。”（《淮陽路》）同樣的觀點也見於《隋師東》，在他看來，討李同捷的戰爭，如果處理得當，是可以避免的。但因人謀不臧，貿然發動，使朝野都付出重大的代價。“但須鸞鷟巢阿閣，豈假鷗鷺在泮林？”祇要賢人當政，就不患地方節鎮任非其人了。這是詩人明確表示的政治態度。李商隱雖然擁護對藩鎮用兵，但他認為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在於朝廷中賢者當權，祇有賢者當權，纔能任用良將為地方節鎮。他的矛頭是指向當時把持朝政的宦官的。

宦官專權是唐王朝面臨的另一重要政治問題。中唐以後的宦官，“迫脅天子，下視宰相，陵暴朝士如草芥”（《通鑑·唐紀》文宗大和九年）。他們跋扈恣肆，氣焰囂張，使朝野人士噤若寒蟬。李商隱經歷的一次重大宦官亂政，是發生在大和九年的“甘露之變”。他以一枝遒勁的筆描寫了晚唐時期這次有深遠影響的社會動亂。他的《有感二首》、《重有感》、《故番禺侯以賊罪致不辜，事覺母者，他日過其門》、《曲江》等，就是這方面的有名詩篇。在《有感二首》中，他主要批判了李訓、鄭注之輕率淺謀，貽誤國事：“素心雖未易，此舉太無名。”動機雖好，但行動措施缺乏周密的安排。同時怨望文宗托付非人，賢愚不識，對這次事件的失敗也負有責任。作者懷

着沉痛的心情，描寫了大批朝官之被殺害，“鬼籙分朝部，軍烽照上都”，長安到處刀光劍影，一片恐怖氣氛；“誰瞑銜冤目，寧吞欲絕聲”，被殺者死不瞑目，幸存者豈能忍恨吞聲？詩人對之表現了滿腔的憤慨和不平。在《重有感》中，他激勵劉從諫為朝廷效力，及早平亂，對坐視危難不顧的藩鎮極為不滿，最後說：“晝號夜哭並幽顯，早晚星關雪涕收。”長安城內鬼哭狼嚎，人神共憤，宮闕何時收復？抒發了對平定閹官之亂的迫切願望。《故番禺侯以贓罪致不辜，事覺母者，他日過其門》則寫胡証之子胡澥因父親做官貪贓枉法，成了富豪，在這次事件中也被抄家殺頭。作者對胡証的不法行為是批判的，但同情胡澥的無辜受戮。作品的重點在指控仇士良等人殺掠無辜方面：“殺人須顯戮，誰舉漢三章。”說明閹官集團犯了“殺人者死”的嚴重罪行。《曲江》是通過曲江的變化寫甘露之變。程夢星云：“此詩專言文宗。蓋文宗時曲江之興罷，與甘露之事相終始也。曲江之修，因鄭注厭災一言始之；曲江之罷，因李訓甘露一事終之。故但是曲江，而大和間時事足以概見矣。”全詩的主旨在“天荒地變心雖折，若比傷春意未多”兩句，朝廷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，蒿目時艱，令人心碎，但更深重的災難還在後頭呢！表現了作者謀國憂時的遠見。這些都是正面描寫“甘露之變”的，通過寫“甘露之變”，揭露閹官的反動氣焰和凶惡手段。此外，李商隱對閹官集團的指控和批判，在與朋友的贈答詩中也流露出來，對劉蕡就是一個典型例子。劉蕡是個有思想、有氣節的人物。由於應試時在對策中尖銳揭露閹官亂政，觸怒了閹官，結果被貶為柳州司戶參軍。李商隱懷着深摯的敬意和同情寫了《贈劉司戶蕡》、《哭劉蕡》、《哭劉司戶二首》、《哭劉司戶蕡》五首詩。在這些詩中，他反復為劉蕡的遭際鳴不平，“已斷燕鴻初起勢，更驚騷客後歸魂”，為劉蕡之屢遭迫害致慨；“萬里相逢歡復泣，鳳巢西隔九重